

社會之間也須尊重、理解、支持

焦點評論

博 梁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宣布暫緩修例後，國務院港澳辦、外交部、香港中聯辦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負責人分別發表談話，對特區政府這一決定表示支持、理解和尊重。其實，這六個字對於香港整個社會從整場風波中汲取經驗教訓也同樣是「字字千金」。

先談尊重。過去一段時間，香港不少人彷彿忘了「不尊重別人的人，別人也不會尊重他」此一淺顯道理，支持修例與反修例者之間，警察與示威者之間，不同派別立法會議員之間……互相對抗、互相攻擊，就這樣，彼此分歧和裂痕愈來愈深，甚至出現了互相的猜忌，試問在一個缺乏尊重的氛圍下，大家又如何能尋求共識呢？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在六月十六日父親節遊行早上的一個社交媒體帖文，愚以為很值得大家深思，他提及：「今天有遊行人士參與小弟的父親節活動，人人守禮排隊，沒有對罵，我也善意叮囑他們注意安全，香港就是多元聲音，沒啥大不了！」的確，香港這個民主社會，面對不同意見時，不正正是應該彼此包容，求同存異嗎？

再談理解。《逃犯條例》修訂的「初心」，不得不由台灣殺人案講起，香港男子陳同佳去年涉嫌在台灣殺害其同為港人女友後潛逃回港，但礙於香港與台灣並沒有移交逃犯的安排，香港根本沒有法律基礎把陳同佳引渡到台灣受審，在這個大前提下，政府遂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為的就是還受害者一個公義！同時間，這一次事件也突顯了一個法律漏洞——即使是觸犯嚴重罪行的重罪犯，只要香港跟該個地方沒有引渡協議，也沒法把其引渡！面對這樣一個大漏洞的曝光，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豈能視而不見？因此，政府的修例建議，從根本上說已是一次「遲來的修補」。這個「初心」，即便你是一個反對修例者，都應該予以理解。

最後談支持。歷經兩場人數不少的反修例遊行後，反對派一部分人馬上如獲至寶，煽動群眾嗆呼「林鄭月娥下台」。然而，過去兩年，林鄭月娥在方方面面的政績也是有目共睹，並成功令香港渡過了兩年和諧向前的日子。然而，今次事件，由於工作上的不足，令香港社會出現很大的矛盾和紛爭，令很多市民感到失望和痛心。這方面，林鄭月娥作為特區首長的確責無旁貸，不過，林鄭月娥已為此向市民致歉，並承諾會以最誠意、最謙卑的態度接受批評，加以改進，為廣大市民服務。以事論事，若然社會以單一事件就判林鄭月娥「死刑」，是否公允？是否公道？

再者，正如上文所言，我們必須理解政府以至特首修例的「初心」。理解過後，我們大概就會明白，如此的一個政府，如此的一個特首，確實值得大家繼續支持。

要讓香港由不平靜的日子中恢復過來，不能僅靠中央支持，不能僅靠特區政府工作，更需要的，是香港社會上每一個人的尊重、理解和支持。

外力介入破壞香港修例

議論風生

吳傑莊

修訂《逃犯條例》原本只是堵塞法律漏洞的程序，緣何在香港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引發反對派密集政治化炒作，「台獨」勢力也參與其中，一些駐港外國機構也頻繁關注此事，反對派再次故伎重施組織遊行示威活動，如此過激、過度解讀修例，說明了什麼？

香港反對力量「捕風捉影」、「歪曲事實」的能力一直非同一般，妄圖以扭曲解讀修例來挑起政治鬥爭、保護潛藏海底的「壞魚」是徒勞的。

修訂《逃犯條例》是香港現實的迫切需要，是衆望所歸，是要為受害者伸張正義、堵塞現有法律漏洞、保護守法公民利益。同時，也是維護香港長期以來在國際上建立的法治形象、維護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

由於反對派「妖魔化」修例，蓄意製造社會恐慌，致使有香港市民擔心修例產生的引渡「政治犯」的問題，這完全脫離香港現實情況。香港是國際交通、貿易樞紐，不同地區和國家居民往來頻繁，也正是如此，成就了香港今日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如若沒有一套完善的引渡法律支撐，香港極易成為罪犯逃脫法律制裁逍遙法外的「逃犯天堂」，嚴重威脅香港居民安全。唯有社會安定、法治健全、經濟健康發展，個人的權利才能得到保障。

筆者相信任何一位愛國愛港的香港人士都不願意看見香港有朝一日成為犯罪的避風港。

無論反對派如何罔顧事實、誇大遊行人數，刻意將法律問題政治化，都不及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逾90萬市民網上連署及335個團體支持修例的數字更能反映民意。自香港回歸以來，始終遭受國內外反動組織團體的破壞，假意是推動香港發展、維護正義，實則是藉機挑起香港與內地的矛盾、鞏固其「反中亂港」的力量。

在全球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香港若想繼續保持經濟優勢，便不能再任由小部分反動力量或少數居心不軌的政客牽着鼻子走。不能任由香港小部分「壞魚」在香港社會中肆意妄為，破壞香港健康的政經制度、法治精神和營商環境。

動態看待香港發展，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必然趨勢，衆所周知香港自回歸祖國以來，在社會政治、經濟、人文環境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以來，香港與內地的聯繫日益密切，優勢互補，共同發展。順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未來香港將會與內地在更多層面上需要配合大灣區的建設，包括法律、政策等方面，都需要與時俱進改革。港澳台地區如何在法治制度上改革，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也是必談的話題，如今卻同外國勢力干預而出現障礙，實在令人惋惜。

全國政協委員

勿讓政治奪走校園的靈魂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相信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面對極大的挑戰。隨着反對派歪曲事實「妖魔化」《逃犯條例》修訂後，一些教育組織便趁火打劫般地跳出來狂刷存在感。更不惜以毀掉青年學子前途為代價，要求教師罷工、學生罷課，其醜惡嘴臉頓時表露無遺。在所謂「正義」口號的包裝下，不僅沒有負起「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倒是歪理邪說滿天飛不斷誤導師生。

豈能向學生灌輸政治立場

回想上個星期，香港教育界可謂醜相百態。當大多數辦學團體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沉默的時候，一些校長不單沒有想辦法保護學生，反而是將頭緊緊地縮進自己的辦公室裏，或者是發出模稜兩可的聲明，更有個別校長打着「尊重學生選擇」的旗號，放縱學生為所欲為，將學生擺在危險的社會運動最前線。一些教師知道在教室內公開要求罷課對自己不利，便用社交媒體發表鼓動學生上街和罷課，將個人政治立場植於學生腦中，讓學生在朋輩、師長壓力下，迫使家長在學校通告上簽署同意罷課。還有一些教師，當社會上警民關係拉扯到極度緊張的時刻，不僅不做和平的橋樑，更是假扮正義的在教室內向學生傳播仇視警方的信息。就在教育界一片混亂、家長焦急彷徨的時刻，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向全港辦學團體、學校發出「緊守崗位守護學生」的信函，重申反對將政治帶入學校，更堅決反對



不平則鳴

李曉迎

任何形式的罷課。

很可惜當教育工作者和民衆一樣，被政治、民粹和自由主義衝昏了頭腦的時候，所有犯法的事情都成為了正義的代名詞。更荒唐的是當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機關履行自己職責的時候，卻被稱之為「白色恐怖」。一個失去理性的人，他只能在鏡中看到幻想的自己，卻將雙眼遮蔽地忽視身邊所有的人。

自上周開始香港大部分學校進入到下學期的大考中，雖然這個社會上有所謂的「一、二百萬」的市民通過行動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立場，但是作為一間學校，裏面仍然有着不同立場的人。無論他們對修例和罷課的立場本着百分百的支持與反對，抑或百分之三十、五十或百分之八十的支持與反對，他們都在一個教室裏、都在一間辦公室裏，也都在一間學校裏。同時因為社會撕裂，很多學校都會接到家長陸續打來的求助電話，有擔心孩子學業成績受影響的，有投訴教師發表個人荒謬言論影響孩子對社會事件認識的，也有因為教師宣傳仇視警察而使得孩子對父母職業感到困擾的，更有提出響應罷課向學校提出無理要求的，最讓人感到難過的就是那些要求學校攔着孩子不要上街的父母們……

逃犯移交：權利與責任（上）



法律論壇

江樂士

的分局。國際刑警組織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是「紅色通緝令」（Red Notice），這是向各地執法人員發出一項請求，要求他們找到和暫時逮捕被通緝的逃犯，等候引渡或移交。通過抓捕逃犯，它有助於確保逃犯在全世界無處可逃。例如，去年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後，浙江省貪污嫌疑人姚金琦在歐洲聯盟被捕，他被保加利亞遣返中國受審。然而，在香港，紅色通緝令制度完全沒有作用，因為許多逃犯如果被發現躲在這裏，既不會被引渡也不會被移交，這破壞了國際刑警組織的其中一個關鍵目標，即以遣返逃犯作為全球化犯罪的威懾力量。

是時候擺脫負面形象

因此，香港不僅辜負了自己，也辜負了它在世界各地的刑事司法夥伴，現在是時候讓它擺脫作為中國的罪犯庇護地的形象。我堅信，在回歸22年後，某人可以在北京搶劫一家銀行，在上海幹下強姦案，或在南京販運毒品，然後在香港避風頭的情況，亟須糾正。雖然有些人將這種狀況描述為「防火牆」，但事實上，這是一種犯罪特許，破壞了全國乃至其他地區的有效執法。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清楚認識到這一點，保安局的修例建議提供了一個明智的方法，讓香港終於能履行對其他司法管轄區的責任。

然而，建立一個能夠引渡一個人的機制，與實際引渡某人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別，希望人們能夠理解這一點。例如，英國與獨裁政權、失敗國家和內戰國家簽訂了引渡協議，但實際上，它絕不會將某人引渡到那種地方，而我堅信這裏也是如此。即使不是這類國家，引渡也絕非必然。例如，英國與俄羅斯簽有引渡條約，但在過去17年中，它拒絕了俄羅斯提出的67項引渡請求中的63項。同樣，建立一個將逃犯遣返中國其他地區的機制，當然並不意味著只要提出要求就會移交，因為還有許多障礙須克服。

《逃犯條例》（第5條）載有國際公認的嫌疑人保障措施，而香港現行的20項移交逃犯協議也有這些措施。由於有人擔心人們可能因政治原因而面對引渡風險，因此修例建議強調，將不會移交犯了政治性質罪行的嫌疑人，如果是基於遭通緝者的政治觀點（或種族、宗教或國籍）而提出引渡請求以施予懲罰，則有關通緝犯也不會被移交。當然，大多數罪行都沒有政治方面的考量，而且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諸如入室盜竊、綁架或強姦等案件

在這段時間，所有的老師除了要處理期末考試的試卷、成績卡、試後活動之外，還要面對辦學團體、校長、同事、學生、家長的不同政治立場與訴求，其壓力之大可以想像。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在一間學校裏面，作為一名專業的教師，我們絕不允許學生因為政治偏見或政治立場的不同而讓同窗之情、師生之情，甚至家人的親情而受到影響。此時作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更應該牢記自己使命，擔起應有的責任，就是無論外邊風雲變幻，校園內激情萬千，都不應該因為一邊聲音大而孤立或影響另一邊，都不應該因為個人的政治立場而凌駕於教育專業，都不應該在校園內傳播仇恨與不實言論！因為學校有責任保護每一名學生安全，無論這名學生的政治、宗教、種族、社會地位如何，他們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都有被保護和被愛護的權利。沒有人會認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式的民主！因為這只是打着民主旗號的謊言。

口裏說「民主」其實為選票

當社會逐漸恢復平靜的時刻，那些仍然指鹿為馬地宣傳罷課和仇視政府的組織，請不要再給已經面對極大壓力的教師們增添新的負擔，更不要讓更多的學生離開校園。請撕掉你偽善面具，專業一點，鼓起勇氣告訴大家：其實你只是為了選票，只是想重奪逐漸失去的話語權而已！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

在受考慮移交或逃犯最終面臨審訊時，應該不會面對什麼困難。但是，如果嫌疑人可能在審訊時受到歧視，或因其政治觀點、種族、宗教或國籍而受到懲罰、拘留或限制個人自由，則不會移交。如果逃犯將面臨死刑，如果罪行在兩地都不違法，如果可能提出額外指控，或者違反一罪二審原則，逃犯也不會被遣返。這是一組強大的保護措施，政府為了減輕人們的擔憂，已經說明這些措施還可以得到補充。

不同的法律制度

在「公平審訊」問題上，應當記住，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法律制度，有些比較先進，有些則較不先進，一個司法管轄區審判另一個司法管轄區並不總是有益的。當然，不同的制度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方式發展，但不能就此認為其他制度不可信，或者它們不會用自己的司法程序來確定有罪或無罪。雖然有些人總是急於詆毀內地的法律制度，但就改善刑事程序及伸張正義而言，內地的法律制度與我們的法律越來越一致，這一點不能永遠被忽視。

自前任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誓言「我們必須為中國建立一個現代法律制度」以來，進步的學者和法學家已經接受了他的言論，經常在面對強大阻力的情況下，努力改善刑事司法制度。我很榮幸能見到這些改革者中的許多人，與他們討論已經取得的進展，儘管他們都毫不猶豫地承認，法律制度仍有待改善。不幸的是，大多數批評者其實對內地刑事司法近期的改善知之甚少，更糟的是，許多人根本不感興趣，大概是因為這些改善影響了他們對內地法律制度的先入為主之見。

然而，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發表2018年工作報告時說，司法機構去年在刑事案件中力求堅持兩項原則，即在存疑的情況下不予處罰，以及不允許非法取得的證據。當然，這與西方對刑事司法的態度是一致的，但這肯定不是巧合，因為內地已通過研究其他法律制度，包括我們自己的法律制度，以求使其法律安排現代化。最近內地的司法有一些重大改革，也許最顯著的是在非自願認罪方面。過去，法院只關注認罪是否屬實，而不考慮認罪過程的情況，在改革者的敦促下，這種情況現已改變。201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了全面改革，法院現在必須排除強迫供證，即使供詞屬實。此外，有趣的是，在香港，法庭可以只根據供詞而將被告定罪，而在內地，法庭除了供詞外，也會尋找確鑿的證據，從而為被告提供額外的保障。至於舉證的標準，內地法官被問及時說，他們必須「確定」有罪才能定罪，這距離我們自己的「超出合理懷疑」標準相差不遠。

此外，當局現在鼓勵內地執法人員在較嚴重案件中錄製供證過程，讓法官在審訊時可以看到供詞是如何取得的。當然，最初採用這種做法是香港廉政公署，然後香港警務處也跟隨，現已擴展到內地和澳門。在如今通常公開進行的審訊中，最新的變化是證人出庭作證的頻率遠遠超過以往，他們的證詞因此可以得到檢驗，而較少依賴證據陳述。內地《法律援助條例》2003年生效以來，內地政府和香港政府一樣，必須提供法律援助，缺乏資金的被告及罪案受害者都可使用這項援助。

（註：本文是作者於6月11日在「引渡法與人權：香港政府法案是否為我們的權利提供足夠保障？」研討會的演講，原載《中國日報》6月12日，吳漢鈞，黃金順譯。）

香港大學法學榮譽教授、香港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

